

 思想中的世界

法意哲学家 圆桌

Welten im Kopf-Frankreich/Italien

英格博格·布罗伊尔 Ingeborg Breuer 著

彼德·洛伊施 Peter Leusch

迪特尔·默施 Dieter Mersch

叶隽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法意哲学家圆桌

[德]布劳耶尔 洛伊施 默施著

叶 隽等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意哲学家圆桌/(德)布劳耶尔等著;叶隽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2

ISBN 7-5080-3315-9

I. 法… II. ①布… ②叶… III. 哲学—法国—现代 ②哲学—意大利—现代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4556 号

Ingeborg Breuer, Peter Leusch, Dieter Mersch

Welten im Kopf.

Profile der Gegenwartsphilosophie

© Rotbuch Verlag, Hamburg, 1996

策 划: 沈 默

责任编辑: 李静韬

装帧设计: 闫志杰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24 开

字 数: 147 千字

定 价: 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言

《法意哲学家圆桌》介绍的是当代法国和意大利的思想。这里介绍的作家们,实际上在当代哲学争论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他们中的大部分属于战争期间的那代人。只有艾米尔·齐奥兰和艾姆勒·列维纳斯是例外,他们卒于1995年,还有像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去世了,同龄人如让-保尔·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我们也选择了米歇尔·福柯,虽然他过世也已逾十年,但他在法国不仅以其著作,更以其作为一个伟大知识者的身份影响了那个国家,目前很多著作也对此作出了很好的说明。

之所以将法国哲学和意大利哲学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出于以下两种考虑:其一是因为法国哲学对意大利的影响显而易见——如卡里·瓦蒂默的后现代主义,其二是对于法国理性批评的批判、纠正和回答,诸如表现在对艾柯的解释学、对查理斯·桑德斯·皮尔斯的实用主义符号学的驳斥方面。

这本书的内容源于我们给科隆德国电台所写的广播稿,相关内容曾在该电台连续播放。就此而言,我们应当对黑尔德加特·格蕾表示衷心的感谢,她对相关问题抱有的兴趣对我们的工作及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1996年5月于科隆和柏林

目 录

前言	1
导论:差异万岁	1
符号战胜现实	
博德里亚尔的虚无主义文化哲学	25
苦涩如泪的思想	
齐奥兰的玩世与绝望	38
追踪逃逸路线	
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50

私人的机智或差别的游戏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64

符号迷宫中的阿里阿德涅

艾柯的符号学与文学 83

通往生活艺术的伦理学

福柯的话语、权力和存在 102

从反极权主义到“急救伦理学”

安德列·格鲁克斯曼的政治道德学 115

设路障于山洞入口

与安德列·格鲁克斯曼关于战争和哲学的对话 125

一种不自以为是的思想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欧洲自我批判人类学 140

做事,就像它本身有意义

与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人类学、神话和现代
世界的对话 150

谜团使人保持清醒

列维纳斯的哲学	159
---------------	-----

重要思想结束之后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后现代哲学	178
------------------------	-----

在通往无处的路上

瓦蒂默的“弱小思维”	190
------------------	-----

速度就是力量

保罗·维里奥的现代观	200
------------------	-----

参考文献	213
------------	-----

译后记	220
-----------	-----

导论:差异万岁

—

哈贝马斯 1985 年评论说:“如果我们考虑对社会理论的时代症候的描述,在过去一二十年中,巴黎产生的具有原创性和生产性的理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多。”^[1]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认可了自己的对手的分量。如果要从过去三十年法国思想界的调色板中找到一个主色调的话,那么理性批判是毫无争议的主题。人们粗略贴上后结构主义或者新结构主义标签的思想家们建立了彻头彻尾的理性批评形式,这与哈贝马斯试图拯救“现代性项目”的努力完全背道而驰。

福柯的格言“酷刑,这就是理性”^[2],也是 1977 年一篇福柯访谈的题目。福柯把理性从康德和启蒙赋予它的审判席上拽下来,要让理性在被告席上接受质问。对理性进行根本性的批判还包括排斥和拒绝利奥塔提出的“宏大叙述”:它的理念包括理性优先、主体的自治和解放,以及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法国思想家用很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当代自我理解的全面危机,涉及科学、技术、社会和文化,他们对问题进行尖锐的分析,同时也不乏大胆的阐释。

如果不将德国对法国哲学的接受情况考虑进去的话,就很难在德语的语境下阐明其观点。法国哲学在德国得到众多的争议、

被轻蔑,但同时也被当做时髦,正因为法国哲学以不寻常的犀利针砭时弊——现代和当代存在的问题,直面危机的挑战,桀骜不羁。有人将其贬斥为新的非理性主义,如哈贝马斯指责他们只知模仿效尤,是“文化学中的 Frankolatrie”^[3],有的对着法国哲学指指点点,警告它使科学性进入绝境。相反有其他一些人抱怨大学和出版社用所谓机制封锁的伎俩试图阻截来自法国的新思想。争论中双方各执一词,相互指摘,以至于真正要讨论的东西在喧嚣中反而屈居次要,没有得到准确的领会。细致的考察非常必要,譬如福柯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中用骇人听闻的词“酷刑”来形容理性的。在一个相关采访中有以下解释:“德语的理性(Vernunft)比法语的理性(raison)有更广义的含义。理性在德语中包含了伦理纬度;而在法语中则指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我们在法语中的理解:酷刑,这就是理性。但我非常理解,在德语语义中的理性不可能是酷刑。”^[4]

这种区分是很有启发性的,它将人们从对法国理性批评从臆想的晦涩中带出来,并且探讨了它与德国哲学理性批评直到术语层面的亲和,因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里提出了将理性降低为工具的批判。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和其他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将原来法兰克福学派所推行的理性批判继续下去。这两种思潮都是源于尼采,他在《权力意志》一书中揭露了追求知识和理性的隐藏面具。20世纪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极权专制制度对自然的破坏、理性无所不在“管理世界”的症候——加强了人们对于理性的怀疑,即这不是由于理性在历史上偶然的反常现象,而是在其肇始就隐含了致命的暴力因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这种暴力因素确定为对“同一性”的强制,即在形成统一制度过程中将

所有个体的特点都剥夺,排除所有的他异性。在法国针对这种集权主义倾向的论点为数不鲜,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倡导异质性和不可缩减的多样性:多样性不能也不许回复到单一中去,或者被整体取消,抑或臣服于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差异万岁”——这个略显粗略的关键词可以相当确切地概括大部分学说的共性。将这些观点贬斥为反理性主义有失公允,它们实际上是对启蒙的启蒙,要揭示理性的“暴力因素”,并将其消解。

然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仍坚持理性统一的观念和主体形象,而法国思想家则放弃了它们。他们肯定现象分崩离析的真实存在,认为这是一种新思想得以萌发的机会,希望由此走出西方传统的桎梏。对理性彻头彻尾的批判除了可以追溯到尼采之外,另一个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也影响深远。法国存在主义从人类学角度吸收了早期的海德格尔,而且萨特还将海氏的存在分析引入了他的意识哲学和主体哲学,不仅如此,海德格尔晚期解体西方形而上学的著作给法国哲学的影响巨大。与解体形而上学联系最紧密的——甚至是在术语的运用上——当属德里达的“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它包含了一个带有某种超验意味的差异原则:“延异”(Différance),它使所有形式的“在场”和“同一”思维成为没有根基的海市蜃楼。

法国当代哲学将这种差异思想发展成不同的形式,它们在反对同一原则及所有与之相关的思想家上是一致的。以异化概念为例——异化是失去了可再次认同的主体身份,或在历史终结时毁坏了可重建的整体性——人们可以从中从哲学角度感受到一种神学的死胡同和哲学的停滞;从政治角度看是将所有特色平均化、将

个性扼杀的集权主义陷阱。辩证法在这里被与通过施暴和敲诈得来的和解联系在一起,并且还是被局囿在黑格尔的框架中。在黑格尔那里,每个辩证过程和所有对立都“统一”的唯心理念为基础,因而理性批判的不同版本都将矛头对准了黑格尔,尽管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哲学——1945年到1960年间作为主流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哲学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都是基于黑格尔哲学。福柯1970年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了这个新的联系起诸多思想的反黑格尔主义的重要性,他是这样评价时代的:“我们整个时代,不论在逻辑上还是在认识论上,不论凭借马克思还是尼采,都要致力于摆脱黑格尔。”^[5]

除此之外,黑格尔的自我脱离(Sichabsetzen)还是难逃主体客体对峙的模式,因为世界的客观性被溯源到作为理性机构的主体,而该模式是近代哲学的根本。法国的理性批判矛头直指由笛卡尔开创、经启蒙运动发扬光大的思想秩序,由此看来,它还必须超越一段特定的法国哲学史。在这个超越中,结构主义的思想担当了开路先锋,由此延伸出的是法国当代哲学的理性批判、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交错呼应。

二

早在60年代,结构主义就已经跻身于最重要的思潮,直到80年代,它还是掷地有声的主流。虽然它的最重要的代表——诸如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除了承认结构主义的方法之外,从不以结构主义者自称,结构主义始终是一个集合名词,也可用在它

的继承者后结构主义身上。比较清晰一致的是它们共同的出发点:即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及其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翻新。

索绪尔认为语言(Sprache)优先于言语(Sprechen),即意味着优先于主体。单个的语言符号完全是通过与其他符号的差异而获得意义,不是凭借意识的意图,或者凭借对事物的指涉,而是它在语言内部与其他符号的相对差别。思维与物件(Gegenständlichkeit)同时构成了两组混乱的集合,它们只有通过语言的沟通才相互呈现对方的轮廓。这样语言——作为所有可以被看成符号体系的东西——就获得了一种超验的价值。“结构主义的首要标准就是对发现和承认第三种秩序,或曰第三个领域:即象征。”^[6]结构主义用这种方式修正了形而上学对于语言的轻视。因为传统哲学将语言只看做是符号仓库,主体可以自主的支配它,然而结构主义则反思系统自身的自主性,这个系统主导着言说的愿望,使主体受制于它——与主体的拉丁文“subiectus”词义相符。

结构主义是法国哲学的巨大贡献,使在 20 世纪思想界成为主流的语言哲学得以超越意识哲学,但是它本身也包含了迥异的观点:解释学用“我们说”替代古老的“我思”,由此强调语言的透明度、意义的优先地位和对话的主体间性。其中的语言唯心主义(Sprachidealismus)显而易见,它——被稍作改动(mutates mutandis)——也出现在话语理论中。与其相反的是英国语言哲学,其出发点是一种科学的、不含杂质的语言。从分析的角度,他们将语言概念局限在数学逻辑领域,这种片面性直到在后来的语用学(Pragmatik)中才得以纠正。与此相反,结构主义中占主导的既非意义和相互领会的认同,也非陈述的逻辑性,而是一种结构的

超验性,其本身既非理性又非感性。取代“我思”的是一个匿名的“语言在说”。

结构主义的观点一方面有本质上的弱点,主体在寻求表达的过程中改变语言,但无法规定主体局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结构主义采纳了一个无主体的象征物构成的秩序,以及能指网络的自行其是,这个前提使(后)结构主义得以用特殊的方式分析媒体文化,从而使哲学在与充斥于世的各种符号体系的探讨中取得了丰硕成果:鲍德里亚对语言的自行其是、想当然进行反思,认为这是符号对现实的胜利;另一位哲学家利奥塔被授权主办 1985 年在蓬皮杜艺术中心举行的大型展览“非物质(Immaterialien)”,这是与新的通讯和信息技术进行对话的一次尝试。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直到今天还在塑造着法国哲学的讨论,在政治层面,1968 年 5 月的运动长远的影响了它们。1968 年巴黎学生和工人起义是一件具有时代标志性的事件,除了一战前出生的那代人——列维·斯特劳斯、列维纳斯、齐奥兰——之外,本书所介绍的其他思想家都在其发展过程中持续的受到了它的影响,其中还不乏为 1968 年运动在思想上作准备的人,他们几乎都将个人经验融入到他们的哲学之中。像利奥塔、鲍德里亚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则由此从根本上修正了他们的立场。1968 年 5 月运动意味着哲学与政治、思想与实践的相互挑战,这种交锋具有极大的生产性,正是那些使人幻灭的失败、挫折,导致了早早与马克思主义作别,转向新的思想。当代法国思想不仅仅是当代的,而且如同其字面意义——极具现实感,如同福柯所表述的那样,它极端地提出问题:当今是什么样的?以及它如何超越了哲学?

法国当代哲学——尤其是它的理性批判——最为不齿的就是建立系统的堡垒或者提出封闭的合题(Synthese)。它表达了当代的自我追问,用解构来反讥,其中也不乏掷色子般的实验,与其说它是深思熟虑的论证分析,倒不如说是带有生产性的煽动。尽管如此,法国哲学还是非常强调具体,比德国哲学更注重将材料研究和其他学科的学术成果纳入到自身的反思中来。福柯是精于此道的大家。

三

如果我们考察三十年来法国哲学的概貌,就会看到它呈现出若干阶段,虽然这种划分并非在严格意义上依照历史顺序或者简单的线形模式,但是在一段时期中的确呈现出不同的主题和观念,它们给该时代烙上痕迹。

这样人们就能在回顾理性批判时区分出一个解构主义早期,这并不仅在德里达的著作中得到阐述,而早在古典结构主义那里——尤其是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中——就初见端倪了。列维·斯特劳斯是结构主义之父,他最先将语言学的范式(Paradigma)扩展到社会文化现象,他将亲缘制度和婚姻规则作为像语法那样纯粹的制度来对待。在研究表征中,解构首先遭遇到的是异文化,还不是典范式的——自己的基础,这意味着西方的理性。列维·斯特劳斯在民俗学领域内支解和解构了部落社会规则和行为方式的经验的多样性,为了能够揭示整体的抽象的基本。作为分析者和结构主义方法的大家,他在这里显得大胆而冷静。无论是从内容上

还是从主体上他都抽象出有利于建构的模式。作为民俗学家,他对原始的部落文化充满温情和同情。斯特劳斯为原始和野蛮正名,并且由此成为批判欧洲起源文化民俗学的更新者,成为卢梭的继承者。他攻击了欧洲的人道主义,称其是将自我美化,将个体作为理性的机构推上王位,却反对个人,所以,在《野性的思维》当中,他提到了部落文化的仪式和神话是带有整理性的和开放精神的。由此他将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理性指向他者。然而这个开口却是非常矛盾的:他实际上意味着限制,撤销理性,或者从另外的角度看,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性的扩展和巧妙的升级呢?斯特劳斯提出了一个普遍的符码,即惟一的不变的深层结构,作为欧洲理性与科学,以及野性思维的基础。这个假设将欧洲的理性带到解构的运动中来,因为它想撤销主体和意义,也想释放人类精神的深层结构。如同拉康的理论——无意识是语言的结构一样,斯特劳斯认为人类精神也具有无意识的结构或者语法,它根植在文化当中。利柯从康德哲学中去除了主体,斯特劳斯又将这个论点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中,并且提到了“超理性主义”。^[7]这样一来,解构运动就不再与精神普遍规则理念相脱节,不再与形式上需要建构的深层理性相分割。他结构的整体性并不是说脱离了历史性,而是带有一定的不变和稳定性,斯特劳斯没有将其再继续探讨下去,这应该说是后结构主义与古典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歧点。

福柯将与理性的他者继续下去,但是并没有提出广泛的结构或者是一体性的假设。概念也不再以“神秘思维对抗理性”成对出现,而变成“疯狂对抗理性”。斯特劳斯针对西方文明为其他文化恢复了地位,而福柯同样作为人类学家在自己的文化中找到了同

样的证明。它对欧洲精神病历史、诊所,以及监狱的研究,将欧洲文化的阴暗面提出来,并且发现为了理性、道德和规范,有什么被排除在外,并且被牺牲掉。福柯认为理性其实基于排斥他者的游戏,而这种排斥其实是毫无根据的。从这个角度解构被进行到底:列维劳斯根据普遍语法的方式,试图构想一个普遍的人类精神,而福柯不再寻找一个理性基础,而是完全是根据话语和断裂而偶然的、历史知识型的事实中进行建构。福柯在他的机构和知识历史的反思中可能可以追溯到法国认识论哲学家巴什拉尔(Bachelard)和康吉兰(Canguilhem),以及追溯到 Annales 年鉴历史学派,他们的研究都延伸到心理和社会结构,以及历史鲜艳性。福柯在知识的领域内发现了历史的鲜艳,话语并不拥有超验的真理,真理更多地是依据认识型和话语的内在性进行建构,而话语本身同样也是偶然的,并且会有产生,也确有产生。

福柯在他的《乐观的时政主义》当中提出了话语的偶然性和外在因素,从而批评了理性,而德里达他的名字本身就与解构的概念在狭义上联系紧密,德里达完成了自我反思的转向。德里达带着批判形而上学的意图将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放到他的出发点和他的关键范畴:即放置在语言和符号概念上来考查。

德里达将语言的关系颠倒过来,宣称书写是语言的范例,德里达这样做是和整体的发展有联系的,他标志着书写实际上是语言的外化的一极,是他不可撤销的外在性。只要哲学反思还定位于言说,定位于发音,那么他就是在场的带有暗示性的表象,声音从一个能指转向另一个能指,意义看似直接在场,然而所指却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扬弃,就如同声音在空间中回响一样。为了克服这

一点,文字要抗议语言的自由:主体的消失,符号的解放,意义的推延,解释的迫切性,通过以上这些符号总是可以被不断地以不同方式阅读。

德里达同伽达默尔、Searle 的讨论,可以展现出解构同解释学、话语理论、以及同昂格鲁萨克森哲学的差异。奥斯汀和 Searle 以阅兵表演为例,提出了主体、情景、语言和清晰的(行动)意义的统一——当某人说错话的时候,而德里达则在此试图恶意的破坏说话的可能性。

每一个符号当它在另外的语境当中使用时——昨天或者明天——就总是破碎的,并且具有了歧义。德里达在此批判了在场的理念,只要他是涉及起源、原则、自我意识或者主体。解构主义将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解构进行了更为根本的符号学上的继续,并且试图更极端地将其进行到底。深色的新构词法 Differance(延异)应当与海德格尔本体学的差异相脱离,因为,海氏的概念还停留在意义的真理的存在概念上。而德里达则欢迎后现代的回归,即回到尼采的“对世界^[8]游戏的快乐的肯定……肯定一个由符号构成,毫无瑕疵,无真理,没有起源,对正在进行的阐释开放的世界”。

四

1968年的5月的运动使得哲学政治化了,它直接地批判社会,而解构主义尤其是德里达为代表的许多哲学家却停留在敏感、羞涩和停留在理论层面,直到今天他的观点还依然挑衅着经验哲